

# 这幅明代唐卡 拍出3亿多港元 买家自评出手“任性”

在11月26日举行的香港佳士得秋拍上，著名中国收藏家刘益谦以3.48亿港元的拍卖价格成交，拍下了巨幅明代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，创下了中国艺术品世界拍卖的最高纪录，同时也将唐卡拍卖的历史价格记录提高了近10倍。对此行为，刘益谦在微信中自我评价为“任性！”今年4月，刘益谦曾在香港苏富比春拍期间以2.81亿港元拍下玫茵堂珍藏明成化斗彩鸡缸杯，刷新了中国瓷器的世界拍卖纪录，引起一时轰动。

据悉，在拍卖会现场，这幅唐卡得到场内买家激烈竞拍，通常拍卖一件拍品需时约1分钟，而该唐卡则历时22分钟的竞拍角逐，最终通过电话委托以3.48亿港元的天价成交，创下了中国艺术品在所有国际拍卖行拍卖的最高纪录。

从佳士得提供的资料来看，已知存世的“永乐款”刺绣唐卡仅有三件，其余两件均藏于西藏拉萨大昭寺，因此该拍品弥足珍贵，拍卖前估值为8000万港元。该唐卡做工精巧绝伦，幅面甚大，其长3.1米、宽2.3米，全图以金线及五彩丝线绣成，虽然历经逾六个世纪，仍保持上佳品相，针线细腻，正中是显忿怒相的红夜摩，右上具“大明永乐年施”款。

明代永乐皇帝醉心藏传佛教，本唐卡被认为是皇家赠与佛教大宝法王的器物之一，丝出自杭州，手工出自苏州，应由十几个工匠历时10余年完成。

据悉，该幅唐卡于上世纪40年代辗转流入西方，并于1977年首次出现在伦敦佳士得拍卖现场，以7000英镑拍卖给一位印度收藏家，随后历经1994年100万美元及2002年400万美元的两次易手后来来到香港。除了该拍品，历史上其他唐卡的最高成交价没有突破过2000万人民币。

拍得这幅唐卡的内地收藏家刘益谦表示，他将把这幅唐卡放置于其上海创办的龙美术馆内。拍卖结束后第一时间，刘益谦通过电话表示，“非常自豪将这件具有极高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唐卡带回中国”。随后，刘益谦难掩激动的心情，发了一条微博，他在微博上晒出了该藏品，并用近来的网络流行词“任性”来概括这又一次的土豪拍卖经历：“香港佳士得苦战，竟得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，硬从老外手上夺爱，3.1亿港币落锤，好辛苦。任性！”

## 相关链接

## 刘益谦： 新崛起的收藏大鳄

近年来，刘益谦的名字频频见诸报端，作为新崛起的收藏大鳄，他以6171万元拍下宋徽宗真迹《写生珍禽图》，以4043.2万元拍下了陈逸飞作品《踱步》，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以5824万元拍得宋人《瑞应图》，以7130万元天价买下张大千《红拂女》，以5037万元的价格拍下苏轼《功甫帖》……每年刘益谦砸到收藏领域的资金都上亿元。

今年7月，在香港苏富比春拍会上拍得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的3个多月后，刘益谦现身香港苏富比进行交接手续，他采用刷卡付款，共在现场刷卡24次，每笔1200万港元。当天，身穿格子衬衣的刘益谦在办交接手续的过程中，用这件价值连城的鸡缸杯喝了口茶，当时他的表情明显看出很高兴和激动。刘益谦用鸡缸杯喝茶的照片在网上引发疯狂转载，不少网友感叹说这是有史以来最贵的一杯茶。

刘益谦自称对艺术品“外行”。对于有人质疑他“只买贵的”是不是有“钱多人傻”之嫌，他豪气地回应称：“《功甫帖》起拍价30万美金，现场有十多人和我争，最后花800多万美金买回来，就像我娶一个老婆，长得不漂亮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假的跟他有什么关系？”

作为一名身家达到170多亿元的收藏家，刘益谦坦言自己没有读过好多书。他从初二就开始帮舅舅做皮具生意，每天赚100多元不在话下，也就在当时，他说过一句话叫“你们读书吧，我赚钱去了。”随后开始闯荡江湖。

综合新华社等报道



## 荷兰专家在古船研究学术研讨会上透露 18世纪荷兰商船上很可能有宁波水手

□记者 梅薇 通讯员 黄定福

早在18世纪，荷兰东印度公司就雇佣了一批中国水手。而在这些中国水手中，极可能有阿拉宁波人。昨天，在庆安会馆举行的2014中国古船研究学术研讨会上，荷兰国立莱登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乐史首次透露了这一信息。包乐史喜欢称这些水手为“被遗忘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中国水手”。这位精通汉语的教授表示，“因为很少有人去研究这一群体。”

### 宁波水手为何会出现在荷兰商船上？

据包乐史考证，荷兰东印度公司大量雇佣中国选手始于1780年左右。当时，因为战争、疾病等种种原因，导致来自欧洲的水手人员短缺。这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中国水手。

根据巴达维亚总督和议事会决议册中每月记录的中国水手的人数，可以计算出1784—1793年间，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雇佣了不少于1000名的中国水手。

“航行于亚洲内部，以及经过好望角至荷兰的长途航行线路上，中国水手是荷兰东印度

公司商船上不可或缺的劳动力。”包乐史表示，当时为吸引中国水手应征，“公司开出了十个银币的月薪。这相当于欧洲水手收入的两倍。”

当然，高薪只是中国水手愿意在荷兰商船上工作的一个原因，更重要的是，“当时中国维持了本土与巴达维亚（即现在的印尼首都雅加达，殖民时代曾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）的航运纽带，来自宁波、厦门和广州的帆船每年都会在这一航线上航行。”

包乐史透露，“荷兰东印度公司雇佣的中国水手大部分是福建人，也很可能有宁波人。”

### 中国水手在荷兰商船上过着怎样的生活？

令人好奇的是，这些中国水手当时过着怎样的生活？

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素描收藏室里，藏有一本画册，其中一幅画作《客栈里的中国水手》描绘的是当时中国水手的生活。在这幅画里，一群中国人围着一个大罐，或做饭、或抽烟、或打盹，看上去相当悠闲。

事实上，现实情况并非是这样“田园牧歌般的生活”。“从巴达维亚到荷兰，航行需要约180天。而到了荷兰后，中国水手常常不得不花

上好几个月等待下一趟航行。”包乐史表示，“由于担心中国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客栈借宿或自由行动会引起麻烦，这些水手的活动也被限制在了公司码头的范围内。”

中国水手们在船上的工作条件也是非常艰苦。包乐史说，根据写于1800年的《开吧历代史记》记载：“甲板雇工者，内过残忍刻剥，虽获厚利，而后裔皆无。”而招募中国水手从事长途航行这一职业的名声也很臭，“甚至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。”

### 中国水手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？

昨日举行的2014中国古船研究学术研讨会，吸引了来自荷兰、美国、英国、日本、韩国、德国、波兰以及中国香港、台湾、武汉、宁波等地的海事文化和舟船技术研究专家共30余人参加。

在座的专家对包乐史抛出的这一话题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。来自武汉的中国船舶专家何国卫提出，“我们此前多关注于商船贸易，那么服务于欧洲商船的中国水手，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，也是一个非

常值得研究的课题。”

包乐史认为，当时的中国水手有可能会做些小生意，“比如把中国的商品带到荷兰，或者把荷兰的商品带到中国。”

“传统上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上的船员是从多个欧洲国家中招募的，这些中国水手在其中一定格格不入，那么，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，又是如何与欧洲水手相处的？遗憾的是，由于缺乏原始、可靠的资料，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。”包乐史表示。